

毛泽东哲学和当代中国哲学

胡为雄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航空航天部三院院宣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23.5 千字

1991 年 12 月第一版 1991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7-200-01482-6 / B.32

定价：5.50 元

序

本书由一个引论和上、下两篇共七个章节构成，引论概述了毛泽东何能成为毛泽东哲学的创始人和毛泽东哲学何能成为现代中国哲学的典型代表，并说明了考察毛泽东哲学的现实意义。上篇的四章以粗重的笔调阐述了在中国精神文化中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毛泽东哲学的孕育、产生和发展过程（第一章、第二章），评说了这一哲学的社会历史作用和世界性历史意义（第三章），考察了这一哲学的性质、特征和形态（第四章）。下篇的三章进而探寻了毛泽东哲学与当代中国社会哲学意识的关系（第五章），在毛泽东哲学的创始人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哲学如何从毛泽东的哲学出发得以兴盛（第六章），并立足于现实展望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前景（第七章）。因此，本书名之为《毛泽东哲学和当代中国哲学》。要在很小的篇幅内阐发太多的内容是一件较为困难的事情，因而本书行笔的粗放是在所难免了。乍一看来，本书一开始在第一章谈中国古代文化、谈中外文化交汇及毛泽东如何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似乎离题太远了，但若要把作为现代中国哲学典范的毛泽东哲学予以切实的考察，非把它置于中西文化交汇的背景中来理解不可。不了解中国古代和近代文化及中西文化交汇，就不能全面地、真正地理解毛泽东哲学的性质、特征和形态；不清楚毛泽东为什么从中国传统文化及近代文化中出走，而最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就难以描述毛泽东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并难以揭示其社会历史作用。正因为毛泽东哲学在拥有数千年古文明的中国土壤中扎根，在二十世纪上叶中西文化交汇的河谷里开花，在中国革命的狂风暴雨中结果，这就一方面使得它能成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实体上为辩证唯物

主义的新质哲学；但是另一方面，它又被中国哲学的形态紧紧裹住，使之不论如何的崭新，其血管中涌流着传统文化的血液，其细胞中载负着旧文化精英的遗传密码。作为世界文明产物毛泽东哲学的出世，其客观社会载体当然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哲学既是中国革命伴生的文化骄子，又是这一革命成功的精神生母，它自诞生之日起就以本来面目履行自己的义务和职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完成并转变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之后，它又如同赫日独居太空，并散发出耀眼的光芒。不过十分明显，毛泽东哲学在后一时期内的社会功能远不能与前一时期的社
会功能相匹，但它却仍然代表着现代中国哲学的发展流向。本书在探讨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毛泽东哲学和现代中国哲学的关系时，已关切到这样一个问题：在新的世界文化潮流的冲击下，中国哲学必须再次作出自己的回答，应当在新的时代振然一新以完成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本书在预测未来中国哲学的发展的趋势时，较具体地分析了中国哲学将在怎样的契机中得以振兴和在怎样的基础上得以繁荣，它在新的历史时代将如何展示出自己的灿烂前景。因而明显可见，专门分析毛泽东哲学的局限，分析毛泽东哲学的某些方面在某些场合向错误方面嬗变，是本书之外的任务，虽然本书不可回避地要指出它的某些局限和弱点。本书的目的在于揭示毛泽东哲学的实质及其历史的和现实的作用，并试图阐明如何以毛泽东哲学为思想上的导向，探索到一条振兴和繁荣当代中国哲学的最切近道路。

目 录

序	1
---------	---

上 篇

引 论	3
第一章 毛泽东哲学的孕育	8
一、中国古代文化及其衰微	8
二、中西异质文化的交汇及其后果	14
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和毛泽东的选择	18
第二章 毛泽东哲学的产生和发展	28
一、毛泽东哲学的产生及其标志	28
二、毛泽东哲学发展的历史阶段（上）	35
三、毛泽东哲学发展的历史阶段（下）	48
第三章 毛泽东哲学的历史作用及其意义	62
一、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哲理	62
二、中国哲学面向世界的历史纽结	72
三、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思想丰碑	81
第四章 毛泽东哲学的性质、特征和形态	90
一、毛泽东哲学的性质	90
二、毛泽东哲学的特征	96
三、毛泽东哲学的形态	106

下 篇

第五章 毛泽东哲学和当代中国社会哲学意识	117
----------------------------	-----

一、居社会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想	117
二、重振了民族精神文化	123
三、中国哲学向前发展的历史路碑	132
第六章 毛泽东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兴盛	141
一、世界哲学的新潮流和新特点	142
二、中国哲学的现状及其缘由	149
三、中国哲学的兴盛和毛泽东哲学	162
第七章 中国哲学在当代的使命、它繁盛的根本条件 及其发展前景	170
一、当代中国哲学的历史使命及其走向繁盛的内在契机	170
二、中国哲学繁荣的根本条件	179
三、中国哲学的未来	187
后记	195

附录

《论持久战》中“自觉的能动性”思想	201
毛泽东和他的人道主义	216
毛泽东的“波浪式”有三种含义	225
毛泽东论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	231
从批注集看毛泽东研究哲学的视角	249
毛泽东的主体观	256
拓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领域	268
增订版附言	280

引 论

毛泽东自称是马克思的“学生”。他同马克思相比，除个人特质的不同外，在社会经历方面也有许多不同之处。不象马克思在书房里度过了生命的大部分时光，其成就主要在于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一师毕业后就投身于社会的政治活动和革命活动，尔后更有 22 年的戎马生涯，26 年的治国操劳。因此，即使社会客观条件和个人素质条件具备，他也不可能有时间写出象《资本论》那样的巨著。毛泽东也不象列宁。列宁从事革命活动的大部分时间是侨居国外，通过著作和报纸、通过理论和指示来领导俄国国内的革命。毛泽东一生仅在革命胜利后两次短暂地离开过中国，他一直是中国革命运动的灵魂，中国革命群众的实际领袖，中国革命航船的舵手，中国革命风暴的闪电。列宁的功绩在于解决了“帝国主义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并把社会主义理论第一次付诸实践，从而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毛泽东的不同之处则是把农民推上了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舞台中心，并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从而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并具世界历史意义。毛泽东首先是一个身体力行的实践家和革命家，他领导中国人民摧毁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旧的政治经济结构。从中国历史上看，毛泽东的成功比任何一代社会统一者的成功都要伟大。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更多地）是一介武夫，而毛泽东不仅成功地使中国得以独立和统一，而且还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只有思想家才有的不朽的传世之作，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在艰难卓绝的革命实践活动中，同时写下了极多的有关革命，有关政治、军事、经

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理论著作和文字，若全集出版，其总量会多于世界上古往今来的许许多多的学者，也不逊于任何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典作家^①。

正如马克思、列宁是少见的杰出人物一样，毛泽东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杰出人物。他虽然不象马克思、列宁那样出生在一个文明家庭而生活于一个封建的农民家庭，但他天资聪颖，在学生时代才华横溢、文思过人、品学兼优。在同学中，他被称为“伟器”、“毛奇”，是“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的人；在识才的教师中，他被视为“建国材”、“栋梁材”。毛泽东思学如渴，有锲而不舍之精神和所向披靡之风格。特别是在湖南一师求学及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期间，他打下了深厚的学问功底，以文、哲、政、史、地等科的造诣之为最，他那时已经在思考如何“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②他也酷爱体育锻炼，“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是他的座右铭。相对完善的“固定知识”结构和强健的身体，为毛泽东后来担负起兴亡天下的重任提供了极好的基础。正是从这里出发，毛泽东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在沸腾的历史巫锅里，使自己的精神不断受到炉炖和陶冶，使自己的思想不断得以发展、丰富并达到成熟，从而留下深刻的揭示社会人生哲理的绝世之作。

从哲学意义上讲，如果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第一次系统地分析了新生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及其演进和崩溃的机制，从而建构了“《资本论》的逻辑”；列宁在探讨帝国主义时代

①毛泽东的洋洋大观的各类著作、文字，主要包括各个时期已发表的著作或未发表的著作手稿，负责编辑和主笔的报刊杂志的文章、会议报告或讲话，授课讲义、演讲纪录、谈话记录、诗词等文学作品，为党的文件或重要报刊文章所作的修改和所加的按语，为私人作品所作的修改，学习笔记、读书笔记和读书批注，调查记录、工作建议、政策条文、文件批示、指示、命令、布告、通告、声明、照会、电文、公函、家书、祝辞、题辞等等。

②《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6页。

无产阶级如何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时，使认识论和辩证法统一起来，并企图提炼出“辩证法的要素”，描绘一个以“对立统一”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草图；毛泽东则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在自己的军事、政治、哲学等著作里，把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和列宁的哲学思想，即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和认识论，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结合起来，使自己的哲学带有明显的方法论特征。

毛泽东哲学源远流长，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延伸。正如列宁经过俄国早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普烈汉诺夫学到了马克思主义、及汲取近代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一样，毛泽东经过自己的老师（也是自己的岳丈）杨昌济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精华，和学到了近代西方和中国的资本主义进步文化，经过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学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多次说到自己读了6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7年资产阶级的书，最后才读马列的书。正因为吸取和兼蓄了为后来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作铺垫的中国古代文化精华和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精华，并有一定能为之融会的社会环境为机制，毛泽东就能较快地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故此，毛泽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与整个中国社会的文明程度的最高点是一致的，即是说，中国近代和现代文明发展到何种程度，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就会达到何种程度，任凭是何种天才，总不能超出自己所处的社会历史时代，正如任何人都不能超出自己的生存环境一样。毛泽东把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联结起来，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进步因素与西方先进文化的代表马克思主义理论转为一体，这一方面把中国文化从“传统”和近代水平提高到具有现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水平，另一方面又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有的放矢地用来解决中国当时面临实际问题。毛泽东与王明的根本不同之处是力戒空谈，一切从中国和世界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书本和教条出发。毛泽东曾清醒地意识

到中国社会的落后，而自己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得具有灵活性。他曾幽默地说自己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自己身上是“虎气”为主，“猴气”为辅。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真可谓一个有自知之明、豁然大度、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者。另外，从毛泽东那表现出自己特有风格的众多著作中也可以窥知这一点。毛泽东一贯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要义是掌握其立场、观点方法，使之用于研究中国的现状和历史，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目的是要使中国获得独立、新生、繁荣、昌盛，使中华民族能作为一个优秀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进而使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并为全人类的解放作出较大的贡献。

作为杰出革命家、思想家和理论家的毛泽东，更具有处于巨变时代的大学者风度。他所留下的哲学著作，既有中国传统哲理那样言简意赅的风格，又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光彩；他的军事著作，毕露了他远谋深算、雄韬奇略的军事家才能；他的政治著作中所阐发的思想既切合实际国情，又独具匠心地发挥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他所写的古体诗词，气派雄浑，不同凡响；他的白话文体更是新人耳目、奔放流畅。总之，毛泽东的作品是不可多得的文字珍宝。从主体方面看，它是毛泽东在文化原野上辛勤耕耘的果实，是毛泽东加倍脑力劳动的物化产品。从社会角度看，是中国社会处于革命转变的飞快发展过程中的自我精神表现，是时代智慧的结晶。

伟人毛泽东是从普通人长成的，与普通人一样，他同样具有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正因为毛泽东是伟人，他的弱点、缺点和错误更带有时代印记，更典型、更集中地反映中国人、中国社会及中国革命的弱点和不足。外强侵逼、内部腐败的近代中国社会造就了具有坚韧不拔的反叛性格的毛泽东，使他成为一个极为成功的旧社会的破坏者，但畸形发展的吝啬的时代却没有使毛泽东成为一个新社会的成功建设者。自革命胜利之日起，经历了重重灾难，对帝、官、封切齿痛恨的中国人民向往幸福生活的强

烈愿望，在毛泽东身上集中地表现为不遵循社会发展的规律、趁穷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急于求成情绪。当然，从历时 20 个年头的人民公社的生存历史中，可以依稀窥见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岳麓新村”设想的扩大。主客观条件的交错，以至建国后的中国过多地注意了政治而较少地注意到自然（这正好与费尔巴哈相反），因而造成了建国后社会政治运动的频繁，尤其在十年内乱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种情况在哲学形态上的表现，则是特别强调对立面的斗争和转化。毛泽东的晚年失政不仅表现出了自己过于看重人的意志作用的倾向，也表明了他的哲学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和某种局限，即他的哲学理论也不是尽善尽美的，而是需要随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发展、提高和完善的东西。但是，不论具有何种局限性，毛泽东哲学曾直接地指导过伟大的中国革命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它作为一种新质形态的哲学，使中国哲学来了一次真正的“脱毛”，即从近代形态蜕变为现代形态，并代表了现代和当代中国哲学的主流。历时已半世纪之久的毛泽东哲学，在人们的整个精神生活领域居于主导地位，并在很大程度上注入到人们内层的心理结构中，潜移默化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毛泽东哲学似是一只无形的手，仍统摄着人们的灵魂，仍潜在地然而十分有力地从精神意识上给人以行动示向。因此，把功绩卓著、影响深远的毛泽东哲学，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和一定的文化背景中予以整体的考察，对其理论的性质和社会功能作出切实的全面评价，是一个既具有历史意义又具有现实意义的任务，也是一个非常 important而又非常严肃的任务。

第一章 毛泽东哲学的孕育

正如毛泽东本人是从旧中国社会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一样，毛泽东哲学也同样根植于旧中国文化^①的土壤中。正如离开昨天的中国就难以完整地理解今天的中国一样，离开中国古代文化及近代文化，中国古代哲学及近代哲学，就难以完整地理解毛泽东哲学。换言之，要了解毛泽东哲学的全貌和实质，除了弄清楚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外，必须追溯它赖以生成的另一个深厚的基础——中国古代文化和近代文化，必须研究它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联系。

一、中国古代文化及其衰微

中国古代文化，灿若星汉。它发源并勃兴于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尔后它随着中国封建社会漫长的历史发展道路不断绵延伸展，并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盛衰而盛衰。中国古代文化，其主体是汉族文化，以儒、墨、法、道及（后来传入的）佛学为表征，而其中以儒学占主导地位。这种文化，将政治、人伦、哲学溶为一炉，它教人“通古今之变，穷天人之际”，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主要反映统治阶级利益的文化，对中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权起着精神上的维系作用，并对整个社会生活起着调节作用。在以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

^①文化一词人们理解各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655页。）本书在论及文化时基本上取此义。

和政治为先决条件的基础上，它长期以来影响着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生产和再生产，不断地复制自身、发展自身。因此，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代有高峰，且在各个社会历史时代显露出不同的特色。先秦时代，诸子百家兴起，其中孔学渐壮大生，自成一家。大统一的汉朝建立后，经学受到独尊和宏扬。魏晋时期，玄学泛觞。隋唐朝代，佛学盛行，并形成儒、佛、道三者鼎立的局面。宋时新儒学即程朱理学系统形成，它以儒为表，以佛、道为里，治三教于一炉。明时陆、王心学演化而出。清代朴学应时萌生。

中国古代文化之所以成为一个独立的政—伦—哲型文化系统，莫许是祖述周礼的尊尊亲亲的早熟的孔学及其遗传基因的顽固性使然？它之所以亘古数千年延绵不绝，则应归因于养育这种文化的土壤的特别。这种典型的东方政—伦—哲型文化，从中国的农业—宗法社会土壤中生成。半封闭的大陆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重血缘氏族的宗法制度，大一统的社会政治结构，使得这种文化生生不息，长久独立于世，自成一个文化系统。首先，从地理环境看，中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南部，它有广漠的包括较肥沃平原在内的温带地域，其东南是宽广的海洋，西南是亘延的高山，北部是游牧民族散居的草原及寒漠，它天然地是一种半封闭隔绝的大陆河谷型的地理环境。这种半隔绝的机制使得只是建立在小农式的“丰衣足食”基础上的独立的中国文化系统不可能有发达的信息交流工具，因而缺少强大的开拓能力。况且，中国比邻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一般较之中国落后。其次，从经济性质看，中国社会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这是古代人们聚族而居的先决条件，它形成父系家长制的宗族宗法社会，并从中衍生出大一统的封建政治结构。这种小农经济基础和封建政治结构是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得以生存的温床，它决定古代中国人政—伦—哲型文化的主要心理特质，如敬天法祖，克己复礼，乐道安贫，知足求稳、务实实际、重经验、尚中庸等等。其三，从外部环境看，汉族长期承受着北部地区的地理政治压力。

正是抗击北部游牧民族入侵的需要，便使这种政—伦—哲型文化长久地成为汉族大团结的精神标帜。与此同时，当汉族内部历史上时常爆发农民起义和阶级战争，转化为争夺国家最高统治权的时候，其重血统、重皇位正统的大一统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往往成为历代逐鹿者实现自己政治目标的思想武器。从秦朝前后，用亿万块砖石筑成，后为历代封建统治者维修的万里长城，既是汉族为抗拒外来军事、政治压力而团结在一起的象征，也是汉族这种群体一致性的政—伦—哲型文化代复一代的外在化和物化的凝结。

中国古代文化虽然从主体上代表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但其中也包含有进步、民主、开明的成份，并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地、局部地反映了广大被统治阶级的要求。例如，在孔孟仁学中，孔子的与苛政对立的仁政思想和大同思想，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反映了对那时的未来社会政治结构的美好设想；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表现了中华民族的理性精神和求实、索取精神；墨子的“尚贤”、“兼相爱、交相利”，代表了农工肆人的“平等”主张；孙子的“知己知彼”、“爱卒”“善俘”，体现了古代中国人的思维水平的高超和人道主义的精神^①；司马迁《史记》中的《陈涉世家》，客观上为农民起义领袖树碑立传，宣传了抗暴虐、争自由、非正统的革命思想；屈原的“哀民生之多艰”和范仲淹的

①在古代奴隶社会，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以奴隶为主体组成的军队更是绝对服从统治阶级意志的工具，因而古代军队中士卒的命运相当悲惨，而在战争中被俘者的命运更悲惨。由于古代物质生活资料匮乏，战俘的生命价值有时比牲畜还贱，养不起的战俘往往尽遭杀戮。司马迁的《史记·项羽本纪》曾记录项羽破秦后，一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这还是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其数量的准确性尽管可以考证，但项羽曾坑秦卒则是一个史实。可见，孙子的“爱卒”、“善俘”思想表现了那一时代主张把人当作人看待的人道主义精神，也与其“全国为上”“屈人之兵而非战也”的谋略思想相一致。尔后中国历史上流传的“一将功成万骨枯”说与这种人道主义精神一脉相承。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体现了士大夫的爱国爱民思想；而《水浒传》、《西游记》等这些文学作品，更是显露了被压迫人民群众向往公正、平等的社会生活的愿望；《红楼梦》及《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天仙配》等小说和戏曲，则是对压抑人性的封建婚制的抗议、鞭笞和对自由人性的神往和赞扬。……总之，这些富具民主性的文化，也同样代复一代的承传和发展，虽然它从未占据过统治地位，但却不可分割地隶属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整体。

中国古代文化是一个开放系统。尽管小农经济社会无法提供先进的信息交流工具，但中国文化曾多次竭力外求，以尝试着与外文化系统取得勾通。汉武帝时代，中国文化系统强盛起来，它已具备足够的力量去打破自身的封闭状态，具体表现为张骞屡使西域，开拓“丝绸之路”；这使中国文化第一次主动自觉地面向世界，从而开拓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唐代中国又避海上“丝绸之路”，并把印度的佛教、数学、天文学、医学、逻辑学、哲学、东罗马的建筑技术，中亚和西亚的音乐、舞蹈、绘画、服饰等等主动引入中国。同时，印度也接受了中国的数学、医学、天文学及哲学（玄奘不仅从梵文译佛经，也把《老子》译成梵文），波斯从中国传入了造纸术、缫丝法等等。自唐以来，中国文化更多地影响了比邻国家，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系统地接受了中国的政治、法律、教育制度，从而形成广大“儒教文化圈”。

中国古代文化不仅凭藉广袤的“儒教文化圈”极大的影响着东方世界，而且早在17、18世纪就被传播到那遥远的欧洲，有力地影响了西方世界，尤其是影响了德、法、英等国家。1687年儒家经典著作传至欧洲并被译成拉丁文在巴黎出版后，便为欧洲启蒙运动所追求的使道德与宗教分家的目标提供了理论基础，并给启蒙思想家借助中国文化鞭笞欧洲传统文化以引经据典之便^①。德

① 《美国和中国》(美)费正清著，张理京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12页。

国古典哲学的先驱者莱布尼茨率先研究了中国哲学，他在《中国近事》的导论中称赞“东方的中国”“比我们伦理更美满，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在比较中西文化之后，他说：“在实践哲学方面，欧洲人实不如中国人。”莱布尼茨不仅褒扬中国文化，而且他自己的思想还较多地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例如他的单子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中国宋儒哲学的精华，他的二进位数学思想的形成亦是受到中国古代《易经》的重大启示^①。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等人，更是把中国古代文明视为一种精神力量的源泉，并用以作为“巨杖”来“鞭挞旧欧洲”。伏尔泰推崇孔子“全然不以先知自诩，绝不认为自己受神的启示”，“根本不传播新的宗教，不求助于魔力”；并称赞中国哲学“既无迷信，亦无荒谬的传统”^②。号称“西方孔子”的重农派领袖魁奈，在《中国的专制主义》一书中称赞中国是“在自然法则的范围内进行统治”^③，孟德期鸠在《法的精神》中也指出“孔教否认灵魂不死”，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亦赞扬中国儒教“只须以‘理性’或‘真理’便可以治天下。”在英国，启蒙思想家常常引用“中国人的议论”来批驳《圣经》，并把耶稣、圣保罗和孔子的言论加以比较，认为“中国孔子的话，比较合理”。著名哲学家休谟也认为“孔子的门徒，是天地间最纯正的自然神论的学徒”。在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自称老子对他的影响“巨大”，他“勿以暴力抗恶”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老子“无为”思想的启迪^④。中国哲学文化不仅给欧洲国家的思想启蒙运动以有力的推动，并且还间接地影响了曾经震撼整个欧

①参见《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797页；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第497页。

②《伏尔泰全集》第7集，第330—331页。

③《美国和中国》，（美）费正清著，张理京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12页。

④参阅冯天瑜周积明《中国古文化的奥秘》，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洲的法国大革命^①，其伦理准则甚至渗透到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宪法中。法国大革命的著名领袖罗伯斯比尔在1793年起草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就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格言引为实现人的自由的道德界限^②。另外，中国的艺术、建筑、园艺、陶瓷等还使当时的欧洲兴起了一阵中国热。直至今天，从外国企业界兴起的“孙子兵法热”和“三国热”中，从西方思想家转向东方“寻求古朴而深邃的新鲜思想血液”、“要把东方人的前科学精神和信念注入到西方的科学中去”，从而借助东方思想对“西方进行价值重估”的举动中，也可以看见中国古代优秀文化的经久不衰的魅力及其广泛的世界性影响。

中国古代文化不仅是一个开放系统，还有着顽强的兼蓄融合力和特别的再生延续力，外来冲击或内部震荡，从未使这种文化中断灭绝，而只是使它增生、更新。例如，印度佛教，自公元一世纪引入中国以后，在矛盾和冲突中，最后为中国文化吸收和融合，以至隋唐以后逐渐出现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天台、华严、禅宗等；到了宋代，佛教则全部被融化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从而生成宋明理学即新儒家。再如，当汉族封建国家政权被较落后的少数民族（如蒙古族、满族等）所推翻，所取代时，入主的统治者为统治的需要不得不学习和适应较先进的代表着中国文化的汉文化，并很快地被这种文化所同化、融化，进而为这种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努力。

历史地看，中国文化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在兴盛之时如繁花盛开，大放异彩，中国文化的丰富内容，如政治、伦理、军事、哲学思想等等，直到今天还以各种积极的或消极的方式影响着社会意识和社会心理，影响着人们的精神风貌，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这种遗存文化潜在地构成任何新质文化的

①参阅朱谦之《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参见《法国宪法集》，巴黎1970年版，第80页。

思想意识基底和前提，而高于中国古代文化的近代文化，则是在清代封建社会开始腐朽衰落；其社会机体已受到资本主义侵蚀的基础上生长而成，并以古代文化直接受到外来文化的侵袭和冲击为其机制。

二、中西异质文化的交汇及其后果

19世纪中叶以后，东方的中国文化圈内，大量汇入了以各条通道大规模东流的西方（欧洲、北美）文化，这是中国亘古以来未有的事。在当时世界各民族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历史时代里，西方文化的东流与冲击，加速了中国古代文化衰落的进程。当西方文化东来时，中国文化已正处于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当时，大清封建王朝已腐败至极。在朝君臣只是醉生梦死，鱼肉下民；在野之民，只能因循守旧，在饥寒交迫中聊以度生。那个昏庸没落的时代，按龚自珍的说法，是一个朝廷无才相，社会无才人，甚至连才偷才盗都没有的时代^①。在那样的时代里，千百个无思想的人会把有思想的人斥为叛逆和异己，千百个庸碌无才者会把即使是有才的人置于死地。——这正是整个社会时代已经处于病人膏肓，无法医治，临于崩死前夕的一种象征。整个社会濒于死亡也就决定了该社会的精神文化也濒于死亡，这具体表现在中国儒家文化面临西方异质文化的侵逼之时，正统士大夫这些传统儒学文化的主要代表者却对之表现出惊人的无知和顽固，他们只知在精神的闭关自守中紧紧抱着“圣学”的僵尸不放，而最后在比自己高出一个时代的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面前，负愤含辱埋葬于中国旧的封建文化的坟墓里。

正是由于世界各民族发展的参差不齐，以弱者面目出现的中国步入了一个赤裸裸的弱肉强食的世界历史时代。当年青力壮的

^① 龚自珍《定庵文集》卷上《乙丙之际著议第九》。